

宏文本：数字时代碎片化传播的意义整合

胡易容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碎片化既是一个数字媒介导致的生活现实,也是二十世纪社会文化的反传统思潮。社交媒体的微文本特性令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碎片化程度尤为加剧。以大数据为典型的量化信息归纳是对碎片化的技术性应对,但这种抽象方式却难以处理多个文本意义联合的方式。传统符号学理论更擅长处理文本意义问题,却往往注重个体文本的阐释。面对碎片化现实,有必要从单个文本为中心的“全文本”拓展至动态的“宏文本”(macro-text)范畴。作为文本复合体,宏文本提供碎片重聚的理论视点;操作层面上,“宏文本”对碎片化文本的跨层联合与“大数据”的海量信息挖掘具有互补性,它们共同构成海量信息时代的把握文本意义的基础手段。

[关键词] 复杂性;碎片化;语境论;宏文本;社交媒体;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G 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6)04-0133-07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6.05.019

一、网络时代文本信息碎片化及其应对

一个世纪前,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成为20世纪普遍蔓延的反传统浪潮的思想源头之一。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同领域的思想家产生了一种共同的以思想和行动超越启蒙时代范畴的冲动,并在二战后蔓延为一场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一场反逻各斯中心的解构主义浪潮。这场思潮宣扬主体消散并试图反对现有的一切话语体系,他们主张通过反“元解释”和“文本意义”来宣称自我。碎片化(fragmentization)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衍生概念之一,最初用来描述后现代社会那种去中心化的社会诸现实。在现代传播语境下,碎片化更贴切地表达了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特质。而今碎片化已经不再只是社会危机的悲观主义设想或后现代主义关于主体离散的危言耸听,它形而下地具体表现为社会信息被分割为彼此不具备连续逻辑的零碎单元。我国学界多用碎片化概念来解释网络传播背景下的信息孤立化和分离趋势,^[1]或用来阐释现代广告传播需针对性地处置的受众、信息及传播

过程的相应对策^[2]。

在传播过程中,碎片化导致的突出矛盾为:海量信息与缺乏内在关联的单个符号文本如何建立内在的联系。对于身处现代媒介社会的个体而言,需要一种新媒介社会的素养来建立不同文本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实现认知上的完整性;对于传播者而言,则需要通过建立起文本内在整合,实现意义有效传播。

碎片化展现了后工业社会中人们信息生活的一种离散态:一方面,社会群体碎片化导致媒介传播意见和信息接受的非中心化;另一方面,是微博、微信等数字“微”媒介勃兴,传播通路的激增,海量信息导致的个人信息接触点的离散化态势。信息传播的来源、主体、时空、手段、渠道、释义、文本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碎片化。社会化媒体进一步加速了信息与时空的碎片化趋势,^[3]其结果是信息意义在传播过程中被消解,并导致麦克卢汉所说的“麻木”现实^[4](PP. 79-83)。本文的重点,则是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待碎片信息的整合可能。最简单的例子诸如,搜索引擎重新将原有文本打碎,形成

[收稿日期] 2016-06-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广西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政府数字传播与文化软实力基地课题“政治文明与符号传播”(LS15C14B)

[作者简介] 胡易容(1978—),男,广西全州人,传播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数字媒体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传播符号学、符号形象学、数字媒体文化研究

了基于检索语法的一个新的集合。通常认为这种新的集合并非一个文本，但经过搜索引擎的重新组合，原有文本的秩序和空间组合关系的确发生了变化，并且在不同检索规则下不同的文本的变化是多样的。这种变化暗示出，文本边界可能是变动不居的，以及文本作为完足的个体可能并不重要。不过，搜索引擎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单一而清晰的结果。扑面而来的海量搜索结果和无限延伸的超链接是对现代人的信息获取力的挑战。各种超链接文本通过各种魅惑和陷阱来令搜索者转入毫不相关的话题信息中。而且，搜索引擎受到的巨大限制是它作为一种链接方式，其每次实现的下一个文本链接是线性的。可视化和大数据的结合一定程度弥补了这种线性链接的不足。大数据方法通过对已知主题的挖掘呈现出一个话题的共时性剖面，并可以通过持续地提供变化趋势来实行一种信息的“镜像式”反映^[5]（PP. 150—158）。

大数据所呈现结果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擅长表述网络数据所反映的态度趋势或分布，并提供基于数据算法的分析结果。但这些结果不提供“元结构”——信息或符号文本的规则性设定。大数据方法的总体特征，是将一个巨量的背景数据通过赋值化，浓缩进一个直观有限的表述结果内。大数据在“人文”层面上表征文本自身形态的丰富性则具有明显缺陷，我们可以通过扫描光谱数据来统计梵高所有画作的用色偏好，但这个结果却无法在人文意义上让读者掌握梵高艺术作品之意义所是。

不仅艺术作品如此，任何文本的文化意义维度都难以用数据量的增加来化约其意义归纳。用科学化的术语来表达即是，这些意义自身乃是不可通过简化方式规约的复杂系统，“复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是不能用简单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并取代简单性的东西。”^[6]（P4）因此，有必要在数据之外有一种基于不可规约的文本自身的意义释读。自从复杂性科学作为一个课题被提出以来，其研究适应范畴日益广泛。“复杂性”的界定尚在讨论过程中，美国《科学》杂志在“复杂性专题”的导言中提出，没有统一的复杂性定义，而应由作者结合具体学科来界定相应的复杂性。从思想渊源的时代背景看，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复杂性学科与之直接相关，但这一代学者的思想无法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影响。他们都主张通过反对现代性、经典性来自我确证。后现代走向极端

的虚无、怀疑和相对主义导致了自身话语影响力的衰落。在卡索尔事件和科学大战之后，后现代自身更需要一种建设性的路径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形成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新解释学等多重流派。从关键词可以看到它们的相近之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键词：分离（disjunction）、差别（difference）、破碎（fragment）、解构（deconstruction）、混沌（chaos）、偶然（chance）、自发（spontaneous）、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等；而复杂性科学注重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多元化（plurali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连通性（connectivity）、关系（relation）、依赖（dependency）、和谐（harmony）、综合（synthesis）、整合（integration）等。^[7]

复杂性科学的主要主张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新的开放系统科学融合的一种产物。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并无具体学科边界限制，通常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笼统地称为“复杂系统”。如，钱学森把“开放的复杂巨系统”^[8]（P5）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技术的偏向。复杂与简单本身不是一个数量定义，而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吴彤提出的复杂系统特征具有适用性，他将其归为不稳定性、多连通性、非集中控制性、不可分解性、涌现性、进化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进化能力六个方面。^[9]可以说，任何对象，在特定视角上都相对于其子系统具有构成复杂性系统的潜力。例如一棵树，就其物种学意义来说的简单个体在落叶时候的力学系统就成为不稳定的复杂系统，每一片落叶与环境的关系都构成一个独立却又彼此关联的子系统。这个整体系统的信息特征是低层次系统所并不具备的复杂维度。复杂性科学原理的策略并不是信息的线性简化或规约，而是通过保留其原始性结构的方式来把握文本。复杂性科学并未预设对象本身的样态复杂，其关键在于拒绝以线性、静态、固化思路去化约对象。复杂性对于人文科学的借鉴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对象处置方式。

复杂性科学不是特定对象物的设定，而是处置对象的特定理念和方法论产物。对于现代网络信息传播而言，这种复杂系统对象观念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文本对象及其意义实现的诸方面。

二、从文本到“宏文本”

（一）文本边界的突破

文本（text），原义为编织物，其狭义指称是

“语言文本”。洛特曼称“文本”是“整体符号”(integral sign), 文本的当代意涵自然涵盖多媒体外延对象。赵毅衡将文本的定义简化为“任何可以被解释的, 文化上有意义的符号组合”或“合一的表意单元”^[10] (P41)。简言之, 文本是一组符号链。既包括语言也包括非语言的图像、视频等一切可表意的符号序列。符号个体是文本构成要素, 其表意是在上下文(context)之中实现的。因而符号文本是在一组系统的相关文本中产生表意。文本与其他文本发生关联的方式在网络传播中是经由“超链接”构成的“超文本”(也称为“链文本”)。“链接”即是文本与其他文本关联的方式。就符号链关系来看, 超文本是一种跨体裁节点的关系描述, 是一个“无限衍义”的文本释义关系。每一次超链接都是一次线性延展, 但延展最终导向何方, 对于信息获取者来说是一个未知数, 只是理论上无限接近全体文化。不过, 既然文本表意不是孤立的, 它在表意过程中的相关单位还是有线索可循的。对于文本与上层文本及社会文化的关联方式, 已有相当多的理论。归纳而言, 有三种处置策略: 语境视角、互文视角、伴随视角。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提出的语境即是考虑影响表意的周边性要素。“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语境主要指上下文关系, 广义语境则是涵盖话语中心、主客因素甚至表达材料等非表达性要素。^[11] 斯帕博和威尔逊(Sperber D & Wilson D)的“关联理论”^[12]对语境论做了认知心理方面的补充。樊岳红在上述基础上把语境归纳为文本语境、境遇语境或实践语境、认知语境^[13] (P18)。语境论将文本与所处环境割裂开来, 有较为强烈的主辅意味。而“非核心文本”的观念则将这些影响表意信息的其他要素均视为一种“文本”。如: 热奈特讨论的型文本, 玛丽·麦克林对文本序列一和序列二的划分。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讨论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14] (P84)就较为关注文本的整体文化背景。她将文本间性扩展到整个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无论是政治的或社会文化的问题都变成了互文本。这种思路主张打破自足文本观念, 具有启发性, 但其后广泛的文本间性旨在进入批评话语, 而非文本形式操作。有必要进一步提出一个模型, 来对网络时代的信息把握提供建构性价值。

赵毅衡提出“伴随文本”(co-text)概念, 是从文本表意中的作用发生方式而言的, 他认为伴随

文本就是符号表意过程中造成的特殊语境。^[10] 伴随文本论与语境论有着相近的外延而不同的出发视角。在解释(符号文本自带的)“内部”语境的时候, 赵毅衡指出, (符号文本自带的)“内部”语境, 就是副文本符号文本的伴随信息。它们与符号形态有很大关系, 但又不是符号本身, 而是符号传达的方式。……即符号表意的伴随文本。^[15] (P141)他进而将伴随文本分为: 显性伴随文本、生成伴随文本和解释伴随文本。

由上, 最广义的“伴随文本论”与“语境论”几乎有着相同的外延。但是两者的理论预设逻辑并不相同: 语境论的预设是符号文本作为一个核心对象, 而对其意义产生影响的仅仅是一些“周边性要素”, 这些周边性要素只是影响要素, 而非“文本”性要素。其表意文本的边界明晰, 且中心固定; 但伴随文本论则将这些周边性符号纳入了“文本”范畴, 甚至与表意文本等而视之。赵毅衡称, 有时它们的作用比表意文本自身有更多意义。“伴随文本”的视点更适合现代符号学理论关于意义的动态性、开放性理念。

(二) 从“全文本”到“宏文本”的跨层性

文本范围的确定是逐步推进的。首先是意图定点的确定, 但每个人的具体解释行为过于多变, 因而“意图定点”无法同时涵涉所有人的解释行为, 只能针对某个设定“解释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从接受者角度来看, 意图定点似乎变动不居难以捉摸。但是这种主观尺度一旦转移到符号文本方面, 就必须形成一个具体领域的文本交互界面。例如, 科研工作可以通过检索语言得到相应范围内的文本。所得结果是有限的, 同时, 检索结果的边界仍是开放的——被检索文献的引用文献和字段会形成一个新的发散圈。这种规则延伸最终结果有可能是全体文献。在具体的一个研究过程中, 必须存在一个意图范围内的有效文本界限。这个界限即是与检索论文的参考目的意图相关的“参考文献”。

由此, 在相对确定的“获义意向”和“意图定点”的设定下, 客观上会形成一组文本。这组文本群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全文本”。笔者曾以新闻为例, 将“新闻全文本”界说为“包括‘文本’和‘伴随文本’在内的一整套与新闻报道活动有关信息的整体呈现”。^① 赵毅衡对全文本作了严谨的理论界定, 他认为“全文本就是进入解释的全部文本元素之集合”, 并建议该术语对应英译为“omni-

text”。^[16]该界定偏向于从接受者的释义角度考虑伴随文本是否进入阅读视野，“全文本”强调的“全”（omni-）是一种涵涉面的最大化。对于“伴随文本”的异质性、跨层次性的强调有所不足。尤其是网络时代及其碎片化的文本现实，有必要考虑释义范畴文本的系统跨层性与多模态性。由此，本文引入了“宏文本”（macro-text）概念。宏文本可以界定为：“以特定获义意向为坐标，以意图定点为半径的动态视界内符号文本的意义联合呈现及结构要素。”宏文本命题是复杂性理论在符号学领域的具体表征，其对网络时代的信息离散的整合具有价值。

宏文本与其他相关概念有显著的区别。

首先，它是相对于单个文本的“大尺度对象”，此处的“大尺度”并非仅指数量的巨大，还包含系统层级结构的多层级结构。相对于全文本的概念，宏文本不仅强调伴随文本要素的进入，并且注重所进入文本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层级关系。由此，“宏文本”与“全文本”对进入释义范畴的文本有着不同的结构观。全文本可概括为“核心文本+伴随文本”，是“主+辅”的联合关系。其中“伴随文本”被视为“核心文本”的辅助性、周边性要素。宏文本则是独立文本系统之间的联合、嵌套、交叉等诸种可能关系的不确定总合，具有去中心化的特质。以一个奥运申办活动为例，该活动在程序意义上“核心文本”应该是“申办申请书”，然而所有的申办国均提交了法律意义上的申办申请书。在有多个获义意向（评委、也包括提供舆论的公众）的情况下，为文本编制的策略或许是某个宣传细节打动了这些投票者。这意味着，此一获义意向起到关键“意义效用”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申报书，而可能是某个展示方面，甚至细节。这意味着从意义效用角度，不能将法律文本视作绝对固定不变的“核心文本”。符合申报程序的法律文本仅仅提供了合法性，而申报成功的目的之达成却取决于诸多关联文本。这种去中心化的思维也是宏文本概念的重要方面。

其次，宏文本对复杂对象是相对性概念。前文已提及，单个符号不是文本，而必须构成表意秩序的符号链，才能称为“文本”。因此，如果说最小的表意单元是符号，则文本就是一个有自身独立结构的最小表意单元；相应地，宏文本就是以独立表意文本单元为子系统的上层结构。赵毅衡提到过“历史演化”等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大局面文

本”^[10]（P45），这与钱学森的将“巨系统”作为对象的策略类似。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强调文本对象自身在一个预设语境下的“巨量”，而并不考虑复杂性的相对性。与各种巨系统或巨量文本不同的是，本文提出的“宏文本”乃是一种基于复杂性观念的文本处置方式。任何文本都在其自身系统中可能具有多层次性和巨大复杂性。以日常生活为基本参照面，有一些直观上显得复杂的宏文本。例如宇宙学的对象相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系统是复杂的、大尺度的；人类文明演化相对于单一社群文化是复杂的，而社群文化相对于个体行为又是复杂的；个体行为的脑神经协调系统相对于单个神经细胞活动也是复杂的。也即，每个对象系统是否具有复杂特征属性，取决于其参照系以及是否遵照复杂性思维的释义方式。因此，宏文本所说的这种大尺度，就是指一种将多个独立文本作为表意子系统协同工作的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待的研究方法。

宏文本视角与全文本及伴随文本理论的相通之处，是它们将外部“框架性要素”的表意功能纳入符号表意范畴。在传媒领域，这种思路的一个具体理论体现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media is the message）。传统结构主义者理解的框架性要素——媒介引起表意功能而被纳入文本讯息中来了。不仅如此，麦克卢汉还说，“媒介可能是比内容更为重要的讯息”。^[17]（P412）实际上，克里斯蒂娃“文本间性”是对社会文化的广泛引入，阿尔都塞“历史与意识形态”、萨义德“对位阅读”都是从更深层的层面来完成符号文本的表意。后面三种理论强调的社会文化全体或政治、历史层面的影响，仍具有基于各自出发点的意义释读侧重。如果将这些侧重去除，符号文本的解读就无限趋近于无限衍义指向的“文化全域”。这就再度上升到一个更宏观层的系统，文本的意义边界也更加模糊。也即，连同网络文本在内的任何一个符号文本的释义路径如果不加约束，其最终都会沿着某个路径发散至接近文化全域。

三、意义“视界”及“宏文本”编制

（一）文本视界及其生成

宏文本的边界开放且具有不确定性。皮尔斯论述表意过程非确定性边界问题时指出，有两种符号表言论。一是“语义论”；二是“形式论”（非语义理论）。形式论主张成为后期皮尔斯的符号传播哲学思想的重要路径。他认为，通过符号从对象向解

释项传递是一种形式：并无既定的（意义）存在物，而实际上是一种“力”，是在某种条件下将要发生的（表意）事实。该形式在对象中得到真正体现，条件关系构成形式的意义^[18]（P793）。皮尔斯“形式论”对于宏文本的佐证，在于两者都强调意义的整体解读。宏文本中的意义向度并非碎片化个体文本信息的叠加，而是涵盖了其结构性框架等形式要素的意义整体。表意过程是一种“形式”，而非孤立的意义。这一整体特性使得碎片化信息在传播的读解策略上再次趋向集中。

宏文本是一个整体观的文本，其意义确定需要作为形式诸要素的符号表意各方面的落实。在“发送者——符号文本——接受者”构成的表意基础过程中，一旦形成文本，整个过程中“接受者”及其具体接受情形就成为唯一未确定的因素。此时，表意者的主动性编码使命已经完成，意图意义只能倾注于文本之中，表意过程进入下一环节。作为意图意义发出者身份的作者离场。作者意图化身为伴随文本寓身于文本之中，成为宏文本的表意途径之一。表意者的身份构筑了符号被释义的一个非零度的文本。此外，基于表意者身份被认可的同一身份，使得他可能后期对符号文本增加新的内容，或通过其身份特权对文本意义作出自身解释以形成新的干涉，这可能造成一种具体的“力”。例如近年网络上广为争论的韩寒代笔事件，其预设是《三重门》的真实作者，会对该文本的文学价值造成根本性影响。作者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还是有相应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会令此书得到的评价截然不同。因此，在整个文本表意过程中，表意者的身份信息为副文本所涵盖。

整个过程中唯一未确定的因素——释义者及其释义情境构成了符号文本完成表意的最后需要确定的因素。在整个过程中，释义者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但他并不能直接出现在伴随文本的确定要素之中。符号文本完成释义，是整个过程中最为惊险的一跃。因为，无论符号文本如何，在释义者未完成释义的情形下，整个表意都不存在。它们至多是一个符号文本的“待在结构”——等待意义被解释。只有诉诸某次确定的表意行为，符号表意才得以最后实现。释义者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现代符号学者认为，整个符号学都从“代码符号学”转向了一种“解释符号学”。对于最后的释义环节来说，决定了某次符号过程的“获义意向”。相对于发出者的“意图定点”来说，“获义意向”是接受

者的符号操作半径。它决定符号衍义的范围、路径，最终也确定了宏文本的“视界”。

“视界”概念最初由尼采和胡塞尔引入哲学，以表示思维受其有限的规定性束缚的方式，以及视野范围扩展规律的本质所在。在伽达默尔看来，“视界”范围包括从一个特殊的观点所能见到的一切。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所谓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是我们悠游其间，而又随我们移动的东西”^[19]（P484）。不过，伽达默尔的理论是以单个文本为工作预设，并且设置了语言的元符号地位。伽达默尔认为，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宏文本的范围并不是以具体文本为边界设定，而是特定获义意向构成的半径。解释者基于其前理解所形成的视界与符号文本所携带的表意视界相遇，进而形成一个新的范畴。释义者遗失的那部分就是视界范围之外的意涵，这为我们确定宏文本的边界提供了一种启示。

此处，宏文本对伽达默尔“视界融合”所作的推进，是将多文本系统纳入考虑，并将“前理解”的基础适用于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符号。宏文本的视界外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的，它是包含动态过程中文本及各层级伴随文本在内的全域。

（二）宏文本视域下的符号文本编制

由于强调不可化约的整体观，宏文本区别于单个具体的伴随文本。比如，相对于“超文本”的链接关系，宏文本更强调复合文本的全域性，是多文本的协同作用。在网络信息的传播中，宏文本思维不仅具有理论认知价值，也具有多领域的普适性。例如，“国家形象传播”作为一个复杂性文本的意义交流行为，其传播总体目标涵盖面异常广泛。其具体执行层面中，一切与该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要素有关的符号均可能构成传播文本的要素。则基于宏文本的发出意图、获义意向设立宏文本的视界，就能确定一次具体的传播战役。因此，现代品牌形象传播必须是一场被称为“战役”的动态过程，通过动态聚合与组合关系完成宏文本的互动性建构，以通达释义者的视界，原因即是由于“宏文本”是历时性与共时性兼具的开放文本系统。

宏文本的动态复杂性还体现为“非线性逻辑”。文本要素的最优化并不导致表意结果的实现必然性。仍以申奥为例，即便所有文本要素均进行最优化准备，最后申办的成功与否，仍具有不确定因

素。现场陈述、演示的不顺畅甚至国内突发的一则新闻，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开放结构在导向最后成功的刹那崩溃。这是由于，作为复杂系统的宏文本在动态表意过程中，意义是通过“涌现”的方式实现的——蝴蝶效应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改变意义走向的可能。例如，有评论认为2011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的出现及其引发的传播，足以毁掉中国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做一整年的国家形象宣传。相对于国家形象传播来说，“小悦悦事件”本身与之的关联性并不强，但从信息涌现的角度来看，它则可能具有形成一场舆论龙卷风的可能。如果这场龙卷风被与奥运申办等国际事件关联起来，则有可能成为申奥宏文本中一个意外涌现的链文本。若该事件发生在申奥的相关时期，整个舆论甚至申报结果都难以预料。在高层次系统中涌现的意义可能会放大、变化，并具有低层次子系统文本中并不具备的特征。^[20] 信息传播史上，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传播策划战役的例子并不鲜见。

结语：作为符号传播学 普适概念的“宏文本”

宏文本具有开放结构性特征，它并不是语境论那种中心明确的结构，而是一个由一组边界未定的文本集合构成的文本库。只有被获义意向照亮时，它的内部结构才呈现出一个瞬间的意义表达的切片。现实的情况是，文本编制所面对的获义意向只是编织者的猜想，因此，文本自身必是具有一定模糊边界的存在。

将宏文本的观念放大到整个人类知识谱系来看。当前的知识谱系已经远远超过个体人脑的范畴。建立在搜索引擎基础上的人工智能其背景知识库比任何个人大脑储备的知识数量都要庞大。但是，部分对人类来说非常简单的直观性问题对机器识别却非常困难。从人工智能发展的三种主导范式

来看，“符号主义”^②的局限是因其封闭结构的理论系统局限。基于对真实世界静止态和符号对应逻辑来看，“符号主义”并非复杂性系统逻辑。它只基于简单系统的知识单元数量增长来尝试解决人工智能符号语义的解释。这种知识谱系的拓展方式缺乏对知识文本的复杂层级性结构的规定。“常识知识工程”的失败说明，整体性情境表征是符号主义所不能穷尽的。^[21] (P7)

当前人工智能的路径选择了更综合的策略，其部分放弃了程序设计者以穷举法直接注入所有知识的策略，通过模拟生物认知行为反馈机制过程，通过“训练”来实现人工智能的“成长”。联结主义从线性计算转向非线性并行分布处理计算，通过硬件与软件结合来进行仿生途径的人工智能探索。不过，自下而上的学习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需要整体性的知识文本谱系的系统性预设干预。有学者指出，尽管行为主义、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在进行深度融合，其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难以在不断变化着的真实语境下很好地处理问题。”^[22] 早期人工智能的探索范式主要是对人脑、计算及其结构的探索。语境论困境和未来的研究趋势暗示了对作为知识谱系的“符号文本”结构的探索可能是对人工智能具有价值的另一种路径。前文已经说明，“语境”纳入文本内部的优点，是使文本不同部分能在“宏文本”的整体路径下协同形成意义视界。

宏文本作为一个基础概念，是基于信息传播内容谱系建构的基本逻辑，其初始动因是着力于现代社会信息碎片化的再整合。宏文本不仅对信息接受者在文本接受时具有一种整体性的把握视野，且对于符号文本的编制具有参照价值。现代社会的各种主体（城市、国家、商品、个人）信息传播战役，均是宏文本编制与传播的战役。正如形象是一个图式认知的符号印象，而如何编码对象文本以及选择何种伴随文本构成整合传播视界，就成为一个宏文本编制的策略问题。

[注 释]

① 全文本的两层意义：一是指包括以文字、图像、画面等方式出现在媒体上的多媒介内容性信息；二是必须包括可能并未在“新闻文本”中出现的显性或隐性的“伴随文本”乃至更为宏大的“生成语境”。参见胡易容：《“新闻经典”抑或“经典新闻”——在“全文本”中构建“新闻经典”》，《中国出版》2011年第12期，

19—23。

② 符号主义 (Symbolism) 是以逻辑推理来模拟的智能，其操作是将物理符号作为人类认知和的基本单元，通过计算机逻辑运算就能模拟人的智能行为。其借用了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却走向了较为纯粹的数理逻辑，实际上这与我们所说的经典符号学方法已经大不相同。

[参考文献]

- [1] 喻国明. 解读新媒体的几个关键词 [J]. 广告大观 (媒介版), 2006, (5).
- [2] 黄升民, 杨雪睿. 碎片化: 品牌传播与大众传媒新趋势 [J]. 现代传播, 2005, (6).
- [3] 刘涛. 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5).
- [4] McLuhan M.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M]. Penguin, 2008.
- [5] 胡易容. 图像符号学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 [6] 埃德加·莫兰. 复杂性思想导论 [M]. 陈一壮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7] 吴彤. 复杂性、科学与后现代思潮 [J]. 内蒙古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4).
- [8] 钱学森. 论系统工程 [M]. 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81.
- [9] 吴彤. 科学哲学视野中的客观复杂性 [J]. 系统科学学报, 2001, (4).
- [10]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1] 魏屹东. 语境与认知推理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6).
- [12]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Wiley-Blackwell, 1986.
- [13] 樊岳红. 后期维特根斯坦语境论研究 [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2.
- [14] Kristeva, Juli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M]. Oxford: Blackwell, 1980.
- [15] 赵毅衡. 论“伴随文本”: 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0, (2).
- [16] 赵毅衡. “全文本”与普遍隐含作者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2, (6).
- [17]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精粹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8] Robin R S.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
- [19] 乐黛云, 叶朗, 倪培耕主编. 世界诗学大辞典 [Z].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
- [20] 彭虹. 涌现与互动——网络传播表现与动力机制的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 (8).
- [21] Dreyfus H L. 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2.
- [22] 董佳蓉. 语境论视野下的人工智能范式发展趋势研究 [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1, (2).

On Macro Text: A Semiotic Reintegration on the Fragmental Texts in the Digital Era

HU Yi-r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PRC)

[Abstract] The miniaturization of text on social media deepens the fragmentation in this cyber era. The big-data method is one way of gaining meaning from the fragmentary texts, but it is far from enough. The difficulty lies in integrating their meaning in higher level. Based on theories of contextualization, intertextuality and co-tex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acro-text” as the key to reunite the fragmentary texts, which is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ingle or static text. Theoretically, macro-text takes complexity theory, and it also provides a cross-level perspective to reintegrate the information fragments. In an operational sense, macro-text is a construction thought which is the complementary of the quantization method offered by the big data method. Both of them will be the necessary means of survival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Key words] meta-structure; fragmentation; contextualization; macro-text; social media; semiotics

(责任编辑 胡晓春/校对 谷雨)